

傅斯年文集

第三卷

欧阳哲生 编

中华书局

傅斯年文集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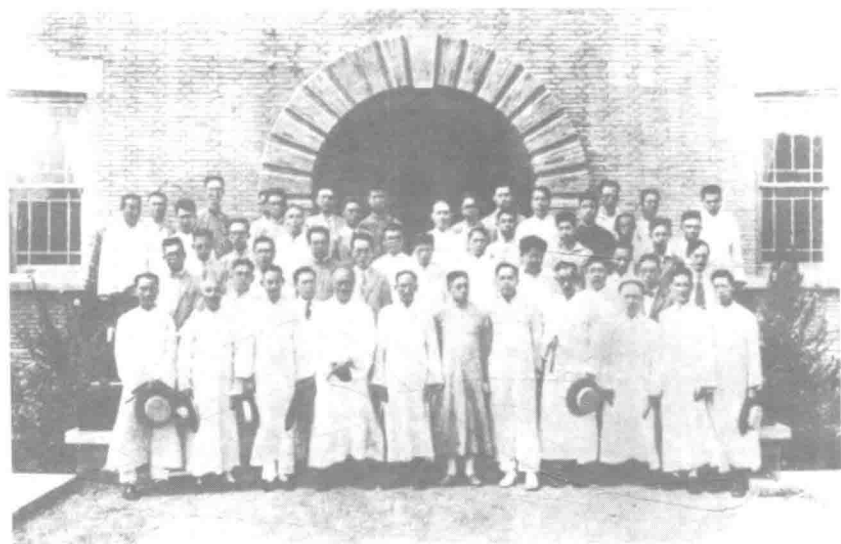
欧阳哲生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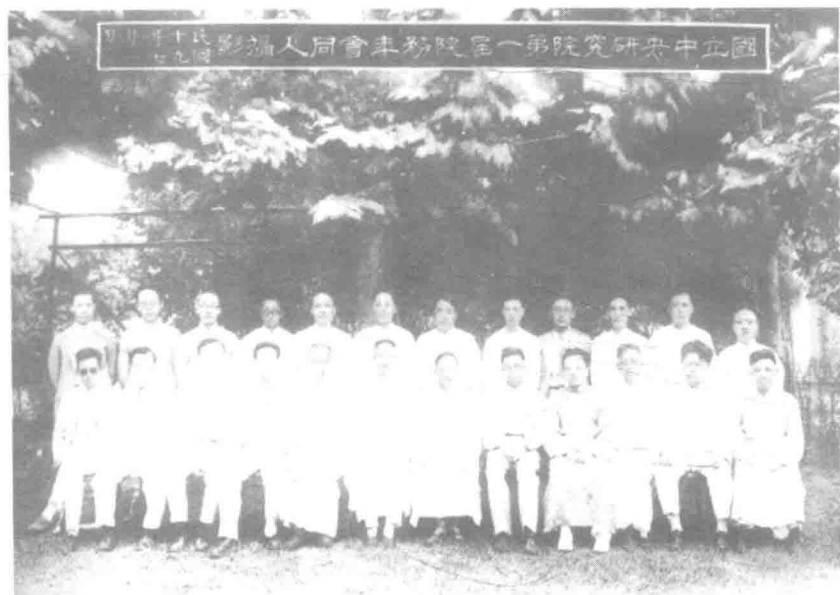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奠基者傅斯年。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一排右七）等在广州宣誓就职合影。二排右四为傅斯年。



1930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会议摄。前排右二为傅斯年、右六为蔡元培。



1931年傅斯年（右二）与梁思永（右一）、李济（左二）、董作宾（左一）合影。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时合影。二排左一为傅斯年。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录傅斯年 1927 年以后撰写的学术文章,或为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读书通讯》等刊物上的论文,或为傅斯年为各种文集、刊物撰写的序跋、发刊词,或为未刊的学术论文手稿、读书札记。

目 录

学术论文	1
1928 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3
附录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	13
1930 年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15
论所谓五等爵	20
姜原	46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54
致《史学杂志》编辑函	65
附录一 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	李 济 68
附录二 甲骨文研究的扩大	董作宾 73
附录三 论文化事业之争执	柳诒徵 83
《明清史料》发刊例言	93
考古学的新方法	95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 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103

《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120
1931 年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	159
戏论一	170
附录 《戏论》解题	杜正胜 173
1932 年	
明成祖生母记疑	175
1933 年	
夷夏东西说	186
1934 年	
《城子崖》序	241
周东封与殷遗民	246
1936 年	
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	254
说《广陵之曲江》	263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269
跋陈槃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	282
《明清史料》复刊志	287
1938 年	
中国民族革命史	289
1940 年	
《中国音韵学研究》序	308
《史记》批语	311

1941 年

再释函皇父	329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331

1942 年

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 几个问题》一文案语	333
附录 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 的几个问题	向 达 334

1943 年

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	353
诸葛亮的青年时期	356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360

1945 年

《六同别录》编辑者告白	362
《殷历谱》序	364

1946 年

《广西石刻展览特刊》序引	370
--------------------	-----

1947 年

宋本《文苑英华》题记	372
------------------	-----

1948 年

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	373
《后汉书》残本跋	387

1950 年

“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	390
关于《清史稿》事敬述所见	393

学术论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几个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十九世纪下半的人们又注意到些个和欧洲语言全不相同的语言，如黑人的话等等，“审音之功”更大进步，成就了甚细密的实验语音学。而一语里面方言研究之发达，更使学者知道语言流变的因缘，所以以前比较言语学尚不过是和动物植物分类学或比较解剖学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语言学所达到的地步，已经是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了。无论综比的系族语学，如印度日耳曼族语学，等等，或各种的专语学，如日耳曼语学、芬兰语学、伊斯兰语学，等等，在现在都成大国。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

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必须看着他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北南宋的人虽然有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马光作《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都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可惜《长编》不存在,我们不得详细看他们的方法,然尚有《通鉴考异》说明史料的异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辩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胡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东的史学派又发了一个好端涯,但康熙以后渐渐的熄灭,无论官书和私著,都未见得开新趋向,这乃由于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言语学中,中国虽然没有普日尼,但中国语本不使中国出普日尼,而中国文字也出了《说文解字》,这书虽然现在看来只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不自知说何文解何字的系统哲学,但当年总是金声玉振的书,何况还有认识方言的辘轳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论,论近代: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

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推绎说去,为甚么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这原故本来显然,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举例说,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

个题目。所以有些从前世传来的题目经过若干时期,不是被解决了,乃是被解散了,因为新的事实证明了旧来问题不成问题,这样的问题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学者,一经为后来发见的事实所不许之后,自然失了他的成为问题的地位。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譬如两部《皇清经解》,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我们这些以外不再成题目,这些以内不肯捐弃任何题目,自然这学问是静止的,是不进步的。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果可以层层堆积上去,即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不觉得累赘,还可以到处出来新路,例如很发达的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如果永远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例如中国的所谓经学中甚多题目,如西洋的哲学。所以中国各地零零碎碎致力于历史或语言范围内事的人也本不少,还有些所谓整理国故的工作,不过每每因为所持住的一些题目不在关键中,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績,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辩,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

这学者岂不是虜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学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国向来有的。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汗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钱大昕论轻唇、舌上古来无之，乃自重唇、舌头出，此言全是，然何以重唇分出一类为轻唇，舌头分出一类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变迁，这层道理非现在审音的人不能明白，钱君固说不出。若把一个熟习语音学的人和这样一个无工具的研究者比长短，是没法子竞争的。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